

论北京市就业压力的成因

李芸莉

(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北京 100053)

摘要: 本文结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从人口、经济、思想文化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形成北京市就业压力的成因:人口增长因素(包括自然增长、迁移增长、外来流动人口)是形成北京市就业压力的人口原因;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包括北京传统工业的结构性调整和北京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形成北京就业压力的经济原因;思想文化历史积淀中的负面影响是形成北京就业压力的思想原因。

关键词: 就业; 人口; 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1)04-0051-06

On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the Pressure of Employment In the City of Beijing

LI Yun-li

(Beijing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Beijing, 100053)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has analyzed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in the city of Beijing in terms of population, economy and ideological culture. The factor of population growth (including natural growth, migratory growth and outsid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the population reason for the pressure. A great deal of problems (including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of demand for labor)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economic reaso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old cultural habit is the ideological reason.

Keywords: employment; population; the city of Beijing

在当今中国,就业问题已日益成为决策者、社会团体、各地区、各单位乃至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关注的焦点和难点。人们对就业压力的关注,任何时候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在宏观经济学中,人们常常把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一起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基本内容,可见就业问题在经济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拟就北京市就业压力的成因作以下分析。

一、人口增长因素

收稿日期: 2001-02-14

作者简介: 李芸莉(1950-),女,浙江宁波人,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就业压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从重要程度来说,应首推人口因素。在社会生产力诸因素中,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人为社会生产、流通、服务和管理等经济活动提供劳动,进行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各种创新活动,维系和推动着经济活动的运行和发展。但人同时又是经济发展中需要就业的劳动者,人需要通过就业来谋生,并维持自身及后代的生存和发展^[1]。如果经济发展不能为劳动者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就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而在实际生活中,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人口数量的控制只有“出生”一个调节阀,而对人口出生进行控制的作用是滞后的,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现时所生下的人口要在15~20年后形成新的劳动力群,但15~20年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发生了变化,是否能吸纳这些劳动力就成为未知数,一旦出现矛盾,就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压力。而北京作为首都,人口对就业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

1.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市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

北京与全国一样,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次人口出生高峰,以至于形成后来的三次就业高峰。

第一次出生高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安定了,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上上下下都信奉“人多力量大”的观点,其中也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的影响,出生高峰的形成势在必然。

第二次出生高峰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作为一般规律,会出现一次补偿性的生育。但不久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生育也自然陷入无序状态。同时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迅速上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迅速上升,人口基数迅速膨胀。

第三次出生高峰从20世纪70年代末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高峰中出生的人群由于上山下乡普遍推迟了婚育期,以至于和第二次高峰期出生人群的婚育期相连,使第三次高峰持续时间长、出生人口多。虽然从70年代后期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控制人口的政策,但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这次出生高峰不可避免。

根据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统计数据可以制成下图,从曲线的走向,可以明显看到这三个高峰。

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形成的就业压力,实际上是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办法解决的。当知识青年大批返城时,实际上已与第二次高峰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适龄期相连。这次就业高峰之所以解决得比较顺利,是因为70年代末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迅猛发展,第三产业蓬勃兴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从边疆、农村返城的知青不怕苦,不怕累,只要有岗位就不挑剔;加上恢复高考制度,相当一批劳动适龄人口走进大学校门接受教育,推迟和延缓了就业;另外当时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领导重视,各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及社会各方面兴办了大量的集体企业和劳动服务公司,安排本单位职工子女和社会待业人员就业,为解决就业问题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据统计,在1979~1990年的11年间,全国累计创办了20万个劳服企业,安置了1600多万城镇待业人员就业,承担了同期全国就业安置任务的20%^[2]。第二次出生高峰引起的第二次就业高峰也得以平稳度过。

现在的状况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高峰出生的人口还未退出劳动适龄期,而第三次高峰出生的人口又进入了劳动适龄期。这次出生高峰人口基数大,持续时间长,又恰逢我国宏观经济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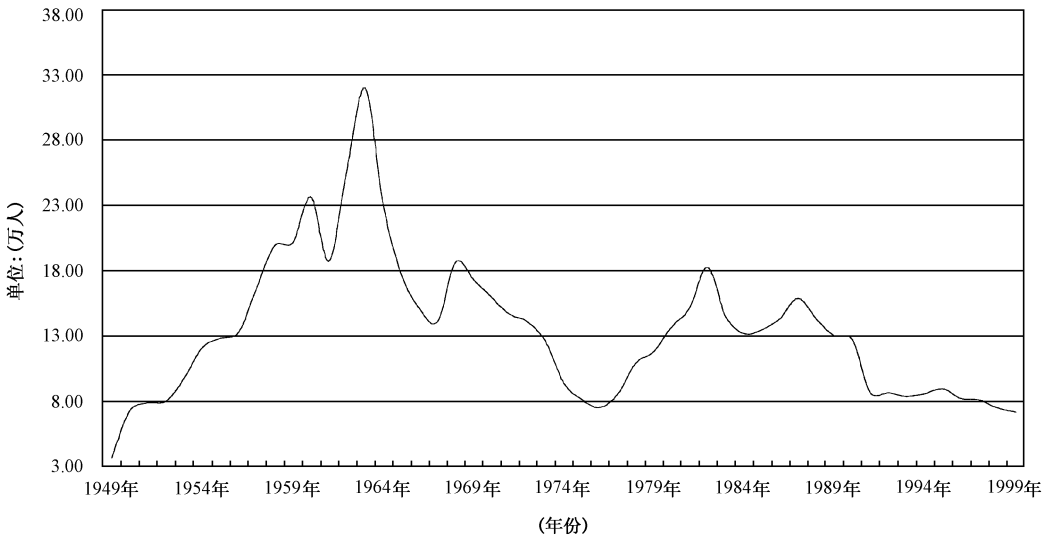


图1 北京市50年来人口出生数量曲线

整,大批冗员下岗待业,东南亚金融危机,世界范围经济萧条,……就业问题的解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次高峰至少将持续10~15年,即至少要等到50年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退出劳动适龄期才能有所缓解。而这次高峰又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和方式来解决,这是我们过去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根据北京市劳动局统计的1980年以来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数制成下图,与图1相比,可以明显看出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对就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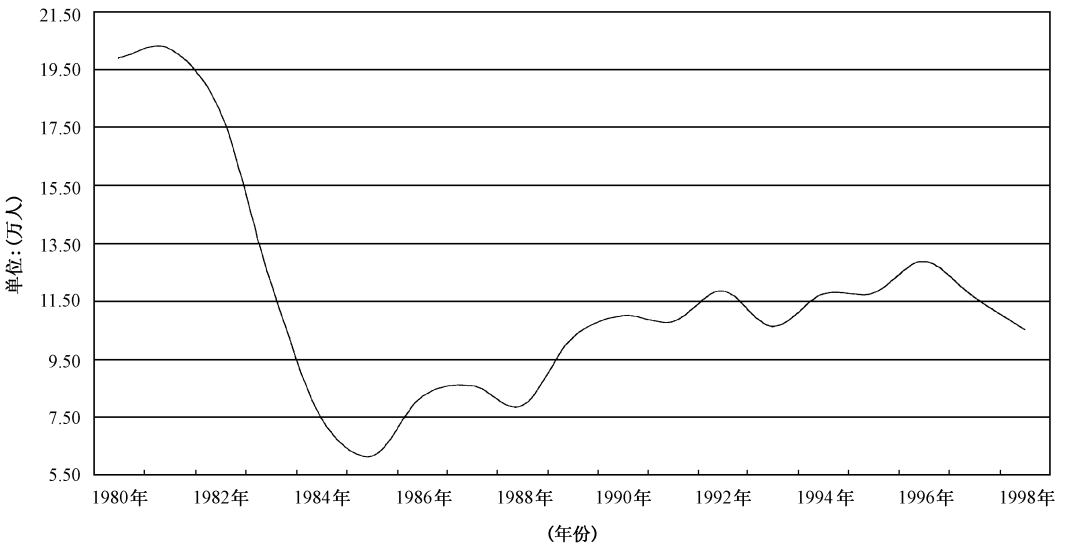


图2 北京市城镇新增劳动力数量曲线

2. 首都对外地劳动力的拉力作用

人口对就业的压力,除了自然出生之外,还有人口迁移。北京作为首都,人口迁移的影响明显地与其他城市有区别。

北京作为首都,由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性质,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人才,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同时由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吸引了一批从事苦脏累活的体力劳动者。这两方面的吸引,加上盲目流入的人员,使北京的劳动力数量剧增,加剧了北京的就业压力。

北京作为中央机关所在地,作为大多数中央级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所在地,每年有相当数量人口的迁入。他们的家属、配偶及其子女(或以后在京出生的子女)自然会成为北京市就业的压力。近8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北京每年人口的迁移增长(迁入—迁出)已明显高于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出生—死亡),约占每年北京户籍人口增长数的70%以上。这些迁移增长的人口绝大多数是青壮年,是处于劳动适龄期的人口,也是处于婚育期的人口,不但会给当前就业带来影响,也会给今后北京人口的自然增长带来相当程度的影响。

北京作为首都,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有人曾把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与上海、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做过对比。上海、广州的周边地区有一个中小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上海、广州市民的经济收入与周边地区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的落差并不太大(约1000元左右),周边地区的农民涌入上海、广州寻找就业机会的损失或机会成本较大,故流入的可能性较小。而北京则不同。北京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周边被经济不甚发达的农村包围着,也没有一个中小城市群可作屏障。北京市民的经济收入与周边地区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的落差(约3000元左右),远远大于上海、广州与其周边地区的收入落差。北京周边地区的农民涌入北京寻找就业机会的损失或机会成本较小,这就大大刺激了周边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北京的积极性。周边地区的人员更多地涌入北京寻找就业机会,必然要挤占一部分本可以由北京人从事的就业岗位。据北京市1997年11月1日进行的外来人口普查,外地来京人员已达285.5万,在京务工经商人员已达180万(近两年的动态监测此数基本稳定)。在这180万个岗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脏累苦活,北京人不愿意干,如建筑、煤炭、环卫等,这一部分通过北京在周边地区所建立的劳务基地有计划地成建制地引入,促进了北京的经济建设。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是北京人可以并愿意从事的劳动,但由于外来人口用工成本低、好管理、易辞退等原因,用工单位宁愿用外地人而不用北京人,如宾馆、餐饮等服务性工作。

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几十年来,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劳动力的大量闲置。北京也同样面临劳动力大量闲置的问题。

1. 传统工业的结构性调整,形成大批冗员下岗等待转岗和再就业

20世纪50年代,北京兴建了四大工业区:东郊的棉纺织工业区、东北郊的无线电工业区、东南郊的机械化工工业区和西郊的重型工业区。这四大工业区的建成奠定了北京工业的初步基础,为北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形成了北京经济以工业为中心,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方针做出了四项指示,要求北京下决心基本上不发展重工业,并且第一次提出要紧紧抓住“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建设”。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进一步指出,北京不要再发展重工业,而应着重发展高精尖的、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尤其要迅速发展食品加工业、电子工业和适合首都特点的其他轻工业,以满足人民生活 and 旅游事业的需要。1995年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再次重申北京作为首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应该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提出北京要更好地为党、政、军首脑机关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

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同时指出,要集中力量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3]。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北京市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总结,应该说,对于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已经明确。随着世界知识经济的“己见端倪”,高科技时代的到来,50年代建成的老传统工业项目需要调整改造,一些工厂需要搬迁。如纺织业的压锭,电子工业的更新换代,化工、冶金对首都环境的影响等等,都决定了必须进行产业结构上的调整,大量的劳动力需要转岗,必然会形成暂时的下岗和失业。

2. 北京市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加大了北京的就业压力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北京出现了一些新兴的行业,如计算机网络业、金融证券业等等,需要相当高层次的专业知识,但北京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力是不适应这些新兴产业的,只能“望岗兴叹”。同时,按照首都功能的要求,第三产业需要大大发展。世界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达63%,而北京1999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达54%,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但北京人对服务、餐饮、修理等“伺候”人的行业不屑一顾,自谋职业又怕冒风险,形成了“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局面。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北京的建筑业有极大的发展,到处都在建设道路、桥梁、住宅、商业楼等。特别是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67项献礼工程,总投资达1200亿元,为社会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但又有多少是由北京人在从事的呢?绝大多数还是由外地人完成的。这次的申奥工程依然如此。北京市政府曾经想统一全市的废旧物资回收行业,招收下岗职工,统一胸牌,统一车型,改善首都城市环境,方便群众,也解决一部分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某区第一批招收50人,报名的北京人只有10人,最后真正上岗的只有1人。

三、思想文化历史积淀中的负面影响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形式,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取决于生产力,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受经济支配的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这种反作用以文化对经济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形式出现,影响着人们的择业观念。

威清差龙在《影响工业化的行为模式》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的模式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指出,在农业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很明显地不同于工业社会中的行为模式,这就如同二者在物质方面的差异一样^[4]。在农业社会中,人们总是趋向于按他们的前辈人所习惯的方式发生自己的行为。他们固执地要求做他们确实知道的事情。传统是重要的,指导着他们的行为;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被认为是明智的,这会受到人们的赞赏;尽量避免冒险和做带有风险的事情。他们愿意不通过任何活动和努力而能获得超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他们尽量避免改变自己的行当、职业,或是用新的方法从事自己的工作,即使在他们认识到新的可能性的时候也是如此。这种行为模式,不利于变革、试验、冒风险、创新和发明^[5]。

他认为,先赋性行为模式的典型性是以身份和某些先赋性原则来分配所得和安排角色。人们要得到某些东西,并不要去努力工作,而是要占据某种地位,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依据的不是个人的能力和成就,而是身份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标准。这种行为模式把对于工作的刺激降到最低限度,并导致低效率,而且,会阻碍劳动力的流动和社会流动^[6]。

北京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几朝古都,威清差龙分析的这种惯性行为和先赋性行为在北京

人的身上有很充分的体现。那种天子脚下天然的优越感,那种不切实际死要面子的虚荣心等等,加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支援首都的传统,使人们形成等、靠、要的思想。改革开放已经多年了,北京人有了问题还是要去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在这一点,北京人和上海人、广州人有很大的区别。

2000年1月10日《北京日报》第11版发表的调查文章《北京人的择业观》公布了勺海公司的一项调查结果。在调查到的739份有效答案中,近60%的人只在1个单位工作过。在曾经有过工作经历的被访者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有60%以上都没有更换过工作单位,而具有较高学历的人这个比例则相应下降。40岁以上的中年人对工作的态度是求稳、保平安,他们参加工作的年头最长,却不愿主动换工作,至少不轻易换工作。年龄在30岁以下的曾更换单位的被访者中,主动跳槽的比例高达95%。从受教育程度不同来看对选择工作重视条件的影响:高中及以下知识层次的人最重视的前三位的因素是相同的,且排位也一样,依次是收入稳定、收入高和福利好。由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的弱势地位使他们求稳的心态占了上风。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更注重知识含量,学以致用,以专业对口为第一位,排第二位的,大专选收入高,大学本科及以上选发挥自己才能。从这个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北京人的求稳、怕冒风险的特征依然存在。但同时我们可喜地看到,随着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年轻人已经开始了转变。

以上从人口、经济、思想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北京就业压力的成因,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影响着人们的就业行为,也影响着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行为,影响着北京的就业形势。要缓解北京的就业压力,必须针对就业压力的成因,有针对性地采取综合性措施才能奏效。

参考文献:

[1] 周天勇. 发展经济学.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2] 劳动部劳动力管理和就业司编. 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就业. 北京: 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3.
[3] 谭维克、高起祥. 首都经济研究. 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9.
[4] 周天勇. 发展经济学.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5] 周天勇. 发展经济学.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6] 周天勇. 发展经济学.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崔凤垣]

(上接第50页)

[13] 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 上海市女职工劳动权益法律意识和法律保护. 妇女就业权益法律保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0.
[14] 上海市城调队. 下岗再就业人员中存在隐性就业/关于上海市3000名下岗人员的调查与分析. 统计研究, 1999, (6).

[15] 刘进. 下岗劳动关系初探. 山东法学, 1999, (3).
[16] 隗斌贤. 改进就业与失业统计方法的探讨. 财经问题研究, 1998, (10).
[17] 邹宝丰, 王鸥. 加快配套改革, 促进隐性就业显性化. 辽宁经济, 1995, (5).

[责任编辑 崔凤垣]